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
百年百篇

74 文艺建设

1941年5月,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,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帷幕。直到1945年4月20日,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结束。相对于大生产运动而言,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方面解决了当时党内的问题。

1942年5月2日至23日,延安整风期间,为端正文艺方向,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、如何服务的问题,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、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。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,甚至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,以及相关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1982年,作家丁玲撰写文章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》。其中回忆到,文艺座谈会以后,整风学习以后,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,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,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。

新的诗歌、木刻、美术、戏剧、音乐、报告文学、小说等百花争艳,五彩缤纷,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。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,具有中国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,不少作品成为经典世代流传,歌剧《白毛女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这场座谈会让文艺界焕然一新 歌剧《白毛女》成为经典世代流传

□ 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



1942年5月,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。吴印咸摄

《白毛女》的问世 表明革命中笔杆子的重要性

歌剧《白毛女》突出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“鬼”,新社会把“鬼”变成人。

故事讲述的是17岁的农家女喜儿,其父杨白劳被苛刻腐朽的封建制度逼得欠了债,债如驴打滚,一年比一年多,最后把杨白劳逼死了,还要拿喜儿去顶债。喜儿被逼逃到山洞里,变成了“鬼”。八路军到来后,把她从山洞里救出,让她重见天日。

虽然延安时期根据地极其艰苦,物质生活条件恶劣,但也给歌剧《白毛女》的诞生提供了基础。1945年,延安鲁迅艺术学院(以下简称鲁艺)的艺术家们,根据“白毛仙姑”的传说,创作出歌剧《白毛女》。该剧把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,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作品之一,迅速风靡,广受赞誉。

词作家、剧作家乔羽对《白毛女》有一个很高的评价:“这不仅仅是一个旧社会把人逼成‘鬼’、新社会把‘鬼’变成人的主题,它还告诉人们旧的制度必须消灭,要用一个新的中国替代旧中国。”

歌剧《白毛女》的问世,表明了党的领导下,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指引下,广大文艺工作者懂得怎么样用文艺武器去团结自己、教育自己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,说明了革命要靠两杆子——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道理。

接时代的“地气” 不照搬旧戏剧形式创新曲调

《白毛女》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的“武器”,起到团结和教育的作用,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“接地气”,表达的内容和形式与当下相符。

1944年,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随西战团到了延安,并调入鲁迅艺术工作团。那时候,受文艺座谈会影响的延

安,在王昆眼里,十分新鲜。

渐渐地,王昆开始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,意识到该讲话确实对文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。“讲话发表前文艺界存在不少的问题,有的脱离人民、脱离现实生活。讲话发表以后,文艺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,创作出了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品。”

歌剧《白毛女》就是代表之一,而王昆扮演的是主角喜儿。“这个戏主题很鲜明,反映了抗日战争当中很尖锐的阶级斗争。”王昆认为,参与到这部作品的许多人,逐渐认识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,艺术和人民的关系,传统民族艺术和时代的关系。

她提到了之前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京戏,有一次想用旧的京剧形式演抗日的戏。“当时想要表现抗日战争里的英雄形象,就编了一个贺龙的戏。但用的是古代将军的装扮,军队也是旧时的打扮。”

当扮演贺龙的演员一出场,就开始念诗:“俺——贺龙是也”。没想到,贺龙看了戏之后,说道:“我就这个样子?不看了。”

“贺龙是新时代的新型将领,不能照搬旧戏剧形式来表现。”王昆说,《白毛女》的创作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“《白毛女》起先用的是秦腔的曲调,但觉得这样一个题材用秦腔来演绎,曲调唱出来后,很容易让人把它跟穿古装的人物联系起来。”

过后,剧本改由贺敬之来写,并重新作曲,结合了民歌、秦腔、河北梆子的曲调,重新创作,让人耳目一新。

《白毛女》创作中 群众是“最权威的批评家”

《白毛女》的成功,离不开“人民”这一关键因素。
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前,毛泽东还曾受邀到鲁艺给大家“吃个小灶”,给各位演艺人员讲话。曾

任鲁艺实验话剧团演员的于蓝回忆,当时毛主席说:“走出学校这个圈子,到人民火热的斗争中间去,那儿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。”

这让大家的思想更加明确: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,作家、文艺家应该深入生活,应该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,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。

同样,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,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不是超阶级的,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。理解大众,要把大众的语言放在首位,如果对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了解,必然脱离群众,生活空虚,不理解大众的语言就谈不上文艺创作。

于蓝表示,在创作《北风吹》这段曲子时,选择了《小白菜,地里黄》调子做基础,按照这个曲词进行加工改造,所以它就带有很浓厚的河北农村小调的味道。“还有喜儿扎上红头绳这一段,是王滨导演设计的。他在山东农村生活过,他就想,过年人家的孩子都有绸缎,而杨白劳要去躲债。做父亲的又心疼自己的孩子,于是便设计了杨白劳给喜儿买二尺红头绳的情节,表达了爱女儿的心情,也符合家庭贫困的情况。”

《白毛女》的创作过程中也少不了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支持。当《白毛女》剧本的创作和排练进行了三个多月时,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写作劳动,写最后一幕初稿时,编剧贺敬之病倒了。于是这一场由丁毅执笔并反复修改。

当时没有剧场,就在露天排演,附近的农民和过路的群众看了排演,也参与讨论,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。特别是因为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不熟悉而产生的一些误解,大多数也被老乡们提出,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了修改。

贺敬之表示,如果演的是群众熟悉的事,“那群众是我们的先生,是最高级的鉴赏者,最权威的批评家”,《白毛女》的创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。

历史的使命 人民的选择

□ 陈弱霄

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中国社会面临两大主要矛盾: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,一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。谁能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,谁就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。

历史赋予时代的责任和使命,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,不是偶然,而是必然。

国民党注定承担不了这个历史重任,因为它没法解决这两大矛盾。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始终是暧昧的。无论是中国同盟会(中国国民党前身)还是光复会,都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,也没有将“反帝”转化成自觉行动。相反,他们为了得到外国帮助尤其是美英日等国支持,彼此经常是“眼来眉去”,互相利用。

同样,人民也没有选择国民党。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,国民党曾有过机会。中共二大后,共产国际被明确为党的上级组织,中国共产党接受其领导。当时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完全押在国民党身上。1923年1月,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《孙文越飞宣言》,也就是“联俄联共”。共产国际认为,中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,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,当时的中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,共产党只能帮助国民党夺取政权,待时机成熟后再来一次类似于“十月革命”的革命,将资本主义赶下台,建立社会主义。

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,但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呢?因为国民党没有选择人民,人民自然不支持它。在革命的动机上,国民党并不关心、也不了解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苦大众的迫切愿望。在推进革命斗争中,他们内心并不重视甚至看不起劳苦大众。认为“四万万中国人,一盘散沙而已”“昧昧无知,鲜能远虑”,甚至对广东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还表现出种种疑虑。显然,国民党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,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迫切愿望,更看不到工人农民的巨大力量,不能依靠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。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,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。正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说,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,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,他们与农村中的地主剥削有密切联系。他们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,更加不愿或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。

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这两大历史任务而诞生。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,规定“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”。中共二大明确提出的主要任务,就是“打倒列强,打倒军阀”。这个口号,直接切中了近代中国两大矛盾,主动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。

中国共产党既是历史的选择,更是人民的选择。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口号,让劳苦大众耳目一新,精神为之一振。“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”,使我们党成为人民的代言人,通过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措施,满足了劳苦大众的迫切诉求,得到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,唤醒民众起来进行武装斗争。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,抛头颅、洒热血,激励民众汇聚起磅礴力量,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,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,赢得了人民的解放。